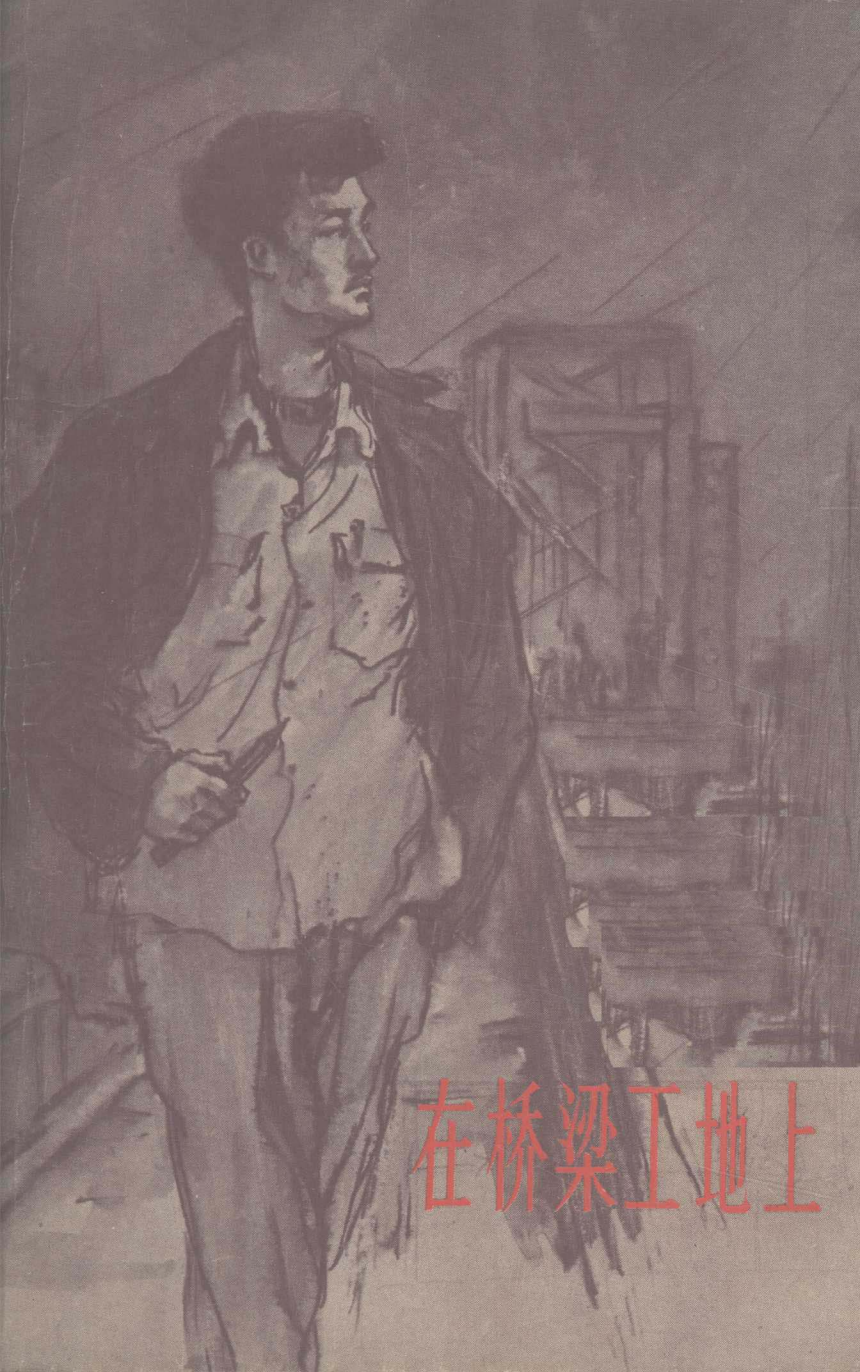




在桥梁工地上

在桥梁工地上

刘宾雁等著

人民文学编辑部编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二、研究设计

为验证假设，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选取了某省 10 家大型制造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 10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850 份，有效回收率为 85%。问卷设计参考了国内外相关文献，涵盖了企业基本情况、数字化转型程度、组织文化、员工素质、技术创新能力、市场开拓能力、资源投入、政策支持、社会环境等方面。数据收集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企业负责人或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发放问卷。数据分析采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研究设计流程图如图 1 所示。

三、数据收集与处理

本研究的数据收集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前期准备、数据收集和数据清洗。前期准备阶段，研究团队制定了详细的问卷设计、发放和回收计划，并对问卷进行了预测试，以确保问卷的信度和效度。

数据收集阶段，研究团队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向 10 家企业发放了 1000 份问卷。在数据清洗阶段，研究团队对回收的 850 份有效问卷进行了仔细检查，剔除了无效问卷和重复问卷，最终得到 850 份有效问卷。数据清洗后的数据将用于后续的分析。

本研究的数据处理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数据描述、数据分析和数据可视化。数据描述阶段，研究团队对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包括频数分布、均值、标准差等。数据分析阶段，研究团队采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数据可视化阶段，研究团队采用图表等形式对数据进行了可视化展示。

目 次

在桥梁工地上..... 刘宾雁(1)

羞 恥..... 高延昌(52)

在桥梁工地上

刘宾雁

一

在河对岸，大桥工程的桥头堡上，我终于找到了桥梁队的罗队长。他正在对一个领工员模样的人布置着甚么事情，那人吃力地用铅笔朝一个小本子上记着。

大概这几年里我变了許多。他眯起眼睛辨認了一会兒，才迈着重步走过来和我握手，兴奋地說：“老刘，还在报館么？來采訪我們啦？好！”

他的嗓音还跟六年前一样，稍微有点沙哑。臉胖了，面色却发黃了。沒等我說明來意，就拉着我跟他一道去巡視工地，要給我看看，对我講講。

在便桥头上，他領了兩件救生衣，給我一件。一面吃力地結着背后的那个扣子，一面笑着說：

“制度！这是制度啊。不穿救生衣，隊長也不許上桥。現在不比从前，甚么都得有个制度。”

緊靠着这座便桥，正在建造一个巨大的拱形鉄桥。

从下面望上去，这座拱桥的工程顯得分外雄偉。第一个拱架已經造好，从河南岸起上升成一个半圓，像一条彩虹似的。簡直不能想像，就憑这么一根窄窄的鋼筋水泥的拱架，能經得住几千噸重的列車不断开过。好像看出了我的驚異，我的老朋友說：

“这是中国第一座鋼拱桥。不用鋼梁，一个跨度就有五十三米那么寬，不簡單哪。从前，連想也不敢想。”

罗隊長給我詳細介紹造桥的准备过程，施工的現狀。我們手扶着便桥的木欄杆，脚下就是奔騰的黃河。比起中下游，这里河水要清得多了：泡沫是白的，浪花也是白的。一股奇怪的味道，随着風和水向我們扑來，越來越濃，像水的清香，又像泥土的香味，有时又覺得它不过就是股潮溼味。春天來了。

我們順着河边慢慢走着。罗隊長对我指点着、解釋着几十丈高的鋼塔，新來的各种建筑机器，工人自己綁扎的各种把竿，一面不住地說：“从前連想也不敢想啊！”“这可不是咱們白天黑夜搞搶修那时候了……”

忽然間，从左側傳來一陣比春雷还响的轟响。接着，有几塊小石头从山上一直滾到我們脚下。一剎那間，覺得脚下的整个土地都顫動起來。我的朋友叫我猜猜这是甚么。我說，当然是爆炸，大概是山后甚么地方在炸石头吧。他笑了，說：

“是爆炸，可不是山后面。这是二三十里以外开隧道呢。大——爆——破，这叫大爆破。听见没有？把几十噸炸药一塊填进去，送药的眼兒里能走得开人。一炮，就下来几万、几十万公方的石头。这才真是中国铁路史上所未有的啊……”

兩人都有点累了。我們在陡峭的黃土崖壁边上坐下来。黄河正好在我們脚下面拐了一个弯，拐得那么柔軟，像一根随便丢在那里的帶子。

“不簡單哪，”他無限感慨地說，“解放前，几十年間黄河上只修了三座桥。解放这么几年，咱們就一鼓气兒造了它三座！你寫吧，我們造桥，你們报道！……”

我很想听听这位老朋友几年來的經歷。从我們在解放战争末期一起搶修桥梁那时候算起，过去整整六年了。罗立正——当时剛剛改行不久的区委書記，現在成了桥梁專家。講业务，不說是大学畢業，就該是專科学校畢業的水平了。据說，这几年他領導过施工的桥梁有三十多座。

“一万四千多公尺，”他在歷数过他造的这些桥的种类以后，竟算出了三十多座桥梁的总長度，“还不算現在同时施工的这五座桥……”

許是因为这一天遇到了老朋友，回憶起几年前充滿战斗的生活，也許是因为在这么好的天气里能和我一起鳥瞰一下自己几年來工作的全貌吧，罗隊長的心情一直

是十分愉快的。在我們快走到大虎溝的時候，他竟輕輕地哼起一個歌兒來。但是；一當我提出了這個問題以後，一切就都變了：

“你們隊裡有個曾工程師吧？”我說，“我這次來，就是要採訪他。”

沒等我把話說完，只見他雙眉越皺越緊，眼睛直視着前方，一股說不清的不痛快在他整個臉上表現出來。他沉吟了一會兒，使勁揉着眉頭，嘆了口氣說：

“你是要找個工程師是不是？”

我點頭。他緊接着說：

“那好辦。我給你推薦另外一個吧。我們技術室的周主任，可以在報紙上介紹介紹。”

我想問，為甚么不可以採訪曾工程師。可是這時我的朋友已向前走去，而且情緒遠不適于提出這個問題，我就把話收住，跟着他朝叮叮當當的石場走去。

我住在技術室主任周維本的房間里。

這是一幢用土坯造成的房屋。黃河邊上，這要算是最好的住所了。它不像帳篷，可以不受任何風雨的威脅，除了大風天氣大粒沙石打在玻璃上的响声以外，簡直一点也不覺得自己是住在曠野里。也不像窯洞，一点也不覺得有甚么陰沉。

在我的房間里听隔壁技術室的話聲是一清二楚，甚

至在我跟別人談話的時候，隔壁的人打電話都能使談話中斷。各處工地在電話里提出的問題，有許多是要技術室主任親自回答的。奇怪的是這些回答都十分相像。說得最多的是“這個問題呢，已經請示工程局的技術處了”，“這個問題呢，施工處還沒答復”。當然，有不少問題，主任還是提出了意見的，但緊接着就一准說——“這是蘇聯專家的意見”，“這是局里張總工程師說的”，“不，這可不是我的話呀，是隊長的意思”……

都是些何等重要的問題必須請示，技術室主任自己拿不出意見呢？

有一回，我正在跟一個起重工人談話，隔壁又傳來周主任打電話的聲音——

“哎，別急嘛，不請示局里怎麼行呢，王處長說這兩天就批示的……”

這時候，那個名叫張廣發的起重工人忽然從條凳上站了起來，氣憤地說：

“又是這一套！把南岸一個螺絲拿到北岸去都要請示，要你這個主任干屁呢？為了你這請示，我們窩了八天工了……”

說完，吐了口唾沫，又坐下來給我講，甚么叫“騎馬扣”，甚么叫“鴛鴦扣”……沒有多大一會兒，他又站了起來，氣憤地說：

“哼，灰塵掉下來都怕把自己砸死，還叫工程師、主任呢！曾工程師就不這樣。跟你說，干起重工的，就願意跟這樣工程師干。他敢決定事情，常說：就這麼干，我負責任！……”

二

我開始知道年輕的工程師曾剛，是在一九五四年春天。一次在工程局施工處等着拿一個資料的時候，听兩個職員談起這個工程師的“怪事”。橋梁隊的兩個工人家屬吵架動了手，一個女人被打傷了，最後扭到法院。出庭作証的人里面，有一個就是工程師曾剛。

“多新鮮，”報告這個新聞的職員，最後加上一句自己的評論，“工程師連工人家屬打架都管了起來，這還是頭一遭兒聽說……”

“那有甚麼新鮮，”第二個人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前些日子人家還給部長寫過一封信呢。”

“甚麼？別瞎扯了！”

“信不信由你。信是請報社轉去的。聽說還打听过有沒有回信呢……”

這兩條新聞是不是確有其事，我沒去了解。引起我注意的，是每逢到工程局來跟有關橋梁建築的部門打交道時，常常听到關於曾剛的一些傳說。事情都一樣，意

見却分为兩派。

談得最多的，当然还不是曾剛在民事訴訟方面的活动或对国际政治局势的兴趣，而是一个工程师任务範圍以内的事。比方說，多少年來造桥墩的沉井都是在岸上，造好再运到河心的，桥梁隊的三分隊却建議在鋼板樁里，在水下造沉井，說是这样每个沉井可以節省一万多塊錢。多少年來，桥身施工的脚手架都是在水上搭的，形狀像个楼房，三分隊却建議把它挪到岸上來，形狀也改变一下，說是可以少用几百根木头……

处長、科長、技術員都对我說過：同样一塊木料或一立方公分的混凝土，在別处如果只能吃七十公斤的力量，在三分隊就得叫它吃一百公斤。

三分隊新事情最多，而三分隊的隊長兼主管工程师就是曾剛。

但是傳說也不限于这一类技術問題。有一次，施工处的几个年輕人就为曾剛的一个举动展开过一次辯論。那是搶修渭河桥的时候发生的事。桥墩要垮了，鋼梁已經朝便桥这边歪下來，看样子一陣大風就能把它給刮到河里。几个技術人員都拿不定主意，躊躇不前。曾剛來了，提出个方案，自己親自走上了便桥，指揮工人用“千斤頂”把鋼梁吊起，然后处理桥墩。一个当时在場的人說，曾剛这种作法本身就是冒險——万一吊不起來怎么办？况且，工程师也沒必要和工人一起站到便桥上去

冒这个生命的危險。反对这个意見的人說，曾剛的作法是根据科学的計算和經驗，不能叫冒險，事实証明是成功了，至于工程师和工人站在一起，那更沒甚么不对，——在工作的緊急关头，工人們知道“工程師也在这里”，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我听到的許多关于曾剛的意見，放在一起就是一場嚴重的、針鋒相对的爭辯。部分人是用欽佩、敬羨的口吻肯定曾剛的大胆精神，另一些人則抱着否定、怀疑的态度，認為这个人冒險，幼稚，不講究科学……

我听到的，畢竟还是后一种意見更多一些。虽然沒有輕易置信，却也受了一定影响。

在凌口大桥工地上住了几天，工地上的景象，和我預料的完全相反。这几年采訪中所見所聞，使我对于建筑工地的某些混乱状态已經習以为常。而凌口大桥工地上，却是有条有理，秩序井然。这里，几乎找不到一个閑人，也看不出一点忙乱。人、机器、工具都安放在最合理的地方。看得出，甚至一个洗石子的地方，一台混凝土攪拌机放在哪里，都是經過一番周密的考慮才安排下來的。一般工地上常見的惱人的“小搬运”，这里几乎沒有。我問过不少普通工人，都不僅知道自己今天、明天的任务是甚么，而且了解本小組小队的任务和当前工作中的主要問題在哪里。所以，也就沒有工地上常常发

生的那种“我在哪兒？”的笑話了。分隊的計劃，每月都超額完成。

這一切，看來都那麼穩當，和“冒險”是一點邊兒也沾不上的。而桥梁隊的其它分隊，情形却正好相反：經常是月初窩工，月底加班加點，有的竟同時二者并存；每年計劃的百分之三十幾拖到最後一個月完成，也是常有的事。但是從來無人說這種雜亂無章、盲目趕工、大量發生人身、質量事故是冒險，反而覺得那里一切都很正常，很穩當。

起初，我主要是從工作方法上去考慮了這種差別。我和曾工程師一起一連坐了兩個夜晚，研究和總結他的經驗。他重視計劃工作，每次編計劃都親自動手。這樣每月、每旬隊里工作中的各種有利因素，不利因素就都經過他的反復思考，隨時記得。一切具體措施，都是在這個全盤考慮下作出的。和一般工程技術人員不同，他親自掌管全隊的合理化建議工作，工人提出甚麼意見，他隨時可以根據當前的和長遠的需要及時作出結論，不必經過繁復的登記、審查、批准等手續……如此等等。

但是談了兩個晚上，我忽然覺得這不是我需要了解的主要之點。這幾年，施工組織上的經驗總結得還算少么？但是在有些人手下，再成功的經驗也行不通。而一到把生產搞得一片混亂、犯了錯誤的時候，這種人卻又撓着頭皮，抱歉地（決不是負咎地）微笑着說：“不行

啊，都是因为咱們經驗不足啊……”缺乏經驗，当然就無可厚非了：誰能責备一个小學生寫了錯別字呢？但是不，在很多場合，这不是或至少不完全是經驗的問題。

不，一个心上遮盖了灰塵的人，不可能單依靠別人的經驗就能增加自己对于新鮮事物的敏感，正像貪生怕死的人不能从黃繼光的作战方法上來學習勇敢一样。

当然，像一切經驗一样，曾剛這兩天所談的經驗中間，也包含着比方法問題更高也更深刻的東西。例如，他說“每逢作計劃，我只是打个底子，叫工人补充”，“我不怕談困难，困难在哪兒，一定得告訴工人——只要提出來，就会有办法解决”，他也激动地說過：“这几年，和工人一起吃一起睡一起工作，才知道劳动的不容易，国家建設的果实來得不易，便是工人們一滴血一滴汗凝結起來的啊。看着工人在水下作业呼吸困难，臉都白了，澆湿了渾身衣服，冻腫了手脚，心里就再也不容許自己有一点疏忽，浪費他們一点力量。同时，也慢慢懂得了工作有困难才有趣，化的力量越大，干完了越愉快……”这里，都反映了他对工人群众的感情，对工人主动精神的信任。他的“联系群众”，也不光是和他們“打成一片”，或者教教他們算術、画圖之类的东西（可惜，許多行政干部和技術人員还認為只要跟工人互称“老王”“老李”，或每天和工人一起打上兩個鐘头扑克，这就是“联系群众”了），而是——想尽办法去

組織這些力量，憑自己的技術知識和經驗把工人和他們的機械、工作場地安排妥當，使每個工人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他的積極性和力量。

但是，這仍然不是主要的東西。

第三次談話，曾剛自己就提出了這個問題。我走進他辦公室的時候，他正在打電話。那邊說話的人已經談了老半天，曾剛在耐心地聽着，一只手輕輕地敲着桌面，見我進來，用眼睛告訴我在桌旁的椅子上坐下，然後對着听筒說：

“沒錯，一點也沒錯。挖土工是干了八方，八個立方公尺。混凝土工是二十七個人。二十七個勞動力完成了四十個人的任務。”

電話里又說了一句話。我看見曾剛的臉色霎時變了，敲着桌子的那只手也忽然停下來，聲音肯定而堅決地說：

“我沒有權利綑住工人的手。至於質量，你們已經檢查了三次。還可以來檢查第四次。……但是請記住，上星期干了八方，下星期就可能干到十方。混凝土工也是，現在他們已經在研究用二十人干四十人的工作了。隊部該早一點作準備。”

放下電話，他忽然笑了。當人們發覺自己在干着可笑的事情時，才這麼笑的。他請我跟他一起出去走走。沒走幾步路，他又那麼笑了，帶着請求的口氣對我說：

“咱們別談經驗了。扯点別的吧。……”

可是他沒說該談些甚么。我等他开头。这时已走到河边。河上已是一片暮色。远处大桥的桥头，燃起了几点灯火。我們兩人同时看見河心的上空有一只老鷹張着翅膀在半空中一动不动地停着。初看去，仿佛是站在一根細細的鉄絲上面，其实是站在空气里。几秒鐘以后，它飛走了。这时曾剛才开口說：

“有时候，我倒羡慕你們作記者、当作家的。哪兒出了甚么好事，有了甚么經驗，你們去寫寫，在报上登登，任务就完成了。……可是实际怎么样呢？事情明明是好的，經驗明明是成功的，要想大干，就有困难。”

我一听，这話里有話，就連忙問下去。像平常一样，曾剛回答得很簡單：

“半年以前，三分隊一个混凝土工人超額一倍。隊部在全隊通報表揚，給了獎勵。上个月，突破定額一倍的增加到四、五十人，隊部也表揚了，可是同时就來了指示，叫分隊領導上控制。这几天，青年工人們提出要搞双倍定額运动，一个人干兩個人的活兒，一个月完成兩個月的任务，隊部忽然火急通知：不許发动，說这是冒險……”

他看我莫名其妙，笑了，說：

“不懂？我也不懂。奧妙也就在这里。这不是头一次了。”

大概他知道話不是幾分鐘就談得完的，自己首先在河邊一塊石頭上坐了下來，我也跟着坐下。

“這個問題，暫且不去談它。就說這加倍定額吧：前幾天黨委書記也問過我工作速度能不能加快這個問題。”他拿起一根干樹枝，在地上畫了個50%，又把它擦掉，說：“以我們現有的力量，把橋梁修建的速度提高一倍，沒有問題。道理很簡單：我們的力量現在只用了一半。你看，機械設備的運用率不到百分之四十。每年因為施工準備工作不好、施工力量組織得不好而浪費的人力，至少有百分之三十，因為沒好好組織而沒有發揮出來的潛力，就無法統計了。可是拿青年工人來說，據我了解，把勞動效率普遍提高百分之五十沒有問題。這就是說，人力可以增加一倍。有了機器又有了人，你說還缺甚麼？”

他用鞋底擦掉那幾個數字，猛一下站了起來。被他的腳踹掉的一堆土，從陡峭的土崖上急滾下去，就像一條土的河流。土粉在下面流個不斷，土塊和石塊在這“水流”的上面飛跳着朝前滾去，最先落到黃河水里。

“就剩下一個問題了：需要用斯塔哈諾夫精神來工作。可是為了大家能夠用斯塔哈諾夫精神工作，那些干計劃、組織、設計工作的人就得首先有斯塔哈諾夫精神。”

他斬釘截鐵地說了這幾句話，然後詢問地望着我。